

哪些风险藏在我们与真相之间？

——透视“名校贫困大学生偷外卖度日被抓”新闻反转背后

近日，江苏南京一起“小区外卖失窃案”在被部分媒体以“名校贫困大学生偷外卖度日被抓”为核心内容进行传播后引发社会关注。由此引发的舆情涉及行政执法尺度、困难学生补贴甚至社会公平等多个方面。20日，警方公布该案调查真相，证实相关传播信息严重失实，舆论随即发生反转。

为何近年来新闻传播中“反转剧”不时出现？在我们与真相之间还藏着哪些风险？社会法治与媒体素质如何提升？新华社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① “名校贫困大学生偷外卖度日”是如何诞生的

不久前，江苏南京一小区多次发生外卖被窃，警方调查发现系该小区居民所为。据警方介绍，由于该居民涉嫌多次盗窃，被刑事拘留。

普通的“小区外卖失窃”是如何变成“名校贫困大学生偷外卖度日被抓”的？记者对其间传播链条进行了梳理。

记者发现，有两家地方媒体分别于16日、17日报道了失窃案。16日的报道中介绍了当事人是“公司职员”“因外卖被偷过一次，此后便起了报复之心，下班后看到小区门口有什么就偷什么”等信息，未透露更多身份背景细节，该报道未引起关注。

而17日的报道中有关人员突然将当事人介绍为“考研大学生”，且出现“为供其深造，家中其他3个兄弟姐妹辍学”等说法，并以此警示人们莫因小失大、自毁前程。

据记者观察，正是17日报道中的信息突然被众多自媒体和传统媒体交叉转引传播，并

在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上形成热点。“名校贫困大学生偷外卖度日被抓”舆情由此成型，各种针对执法部门、教育行政部门的无端批评开始涌现。

舆情持续发酵到20日，当天警方公布调查结果：当事人李某某2018年毕业于湖南省衡阳市某大学，当年来南京工作，目前在南京某公司，有固定收入，租住在雨花台区某小区。李某某父母和大姐在老家务农，二姐、三姐分别在北京、海南工作。据调查及李某某供述，今年5月31日，其购买的外卖餐食在小区门卫处被人拿走，遂产生报复和占便宜的心理，当日起在上述地点多次盗取他人外卖餐食。

此后，权威信息被社会接受，无端批评快速消退。

北京市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兆成介绍，我国刑法对盗窃罪有明确规定。本案李某某多次盗取他人外卖餐食，其行为已涉嫌盗窃罪，警方依法予以处置合情合理。



播风险。苏州大学融媒体发展研究院院长陈一认为，此次舆情引发对“困难大学生补助”措施的质疑，一个原因就在于普通公众获取此类措施信息的局限性较大，对此不够了解。事实上，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我国

学生资助实现了所有学段、所有学校、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三个全覆盖”，在制度上基本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另外，支振锋指出，不少人对自身网络行

为应承担法律责任认识不到位，也助长滋生了大量传播不实信息的行为。他提醒，应特别警惕这种在网络传播中，传播越快捷却离真相越远的风险。

② 哪些风险藏在我们与真相之间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沈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支振锋等认为，受当前传播“碎片化”“流量至上”等多重因素影响，近年来新闻传播中的“反转剧”时有发生，当前在公众与真相之间仍潜藏一些“传播风险”。

——权威信源信息不够准确。“不实信息是经机构媒体的报道和自媒体的‘脑补’而生，但其‘灵感’往往来自权威信源发布的部分新闻信息。”沈阳认为如权威信源信息不够详实，更容易引起传播失实。

记者发现，此次正是有办案人员释放出当事人人为“知名大学本科，目前正在准备考研”“为了他能读本科、读研究生，其他3个兄弟姐妹都辍学了”等不够准确、完整的信息

后，其他媒体“脑补”跟进形成舆情风暴的源头。

——有部分媒体职业素养不高，有的甚至罔顾操守一味逐利。此次事件中，部分知名网络媒体未核对关键信息真伪就进行报道，导致失实信息在部分媒体间被交叉转引。

另外，据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存在部分网络账号为获取流量和广告进行恶意营销，或无中生有造热点，引发社会恐慌；或冒用权威人士名义，发布谣言误导公众；或炮制耸人听闻标题，引发群体焦虑和不安……这些行为扰乱了正常网络传播秩序。正是此类自媒体账号为“引流”获利唯恐天下不乱，故意用失实信息煽风点火、制造舆情。

——公众的信息局限和法治意识短板增大传

③ 全社会应持续提升法治与媒介素养

“权威信息释放后，大众没有再受自媒体情绪化煽动；执法机关表现规范到位，兼顾法理情理。”支振锋认为，总体上看，这起事件体现了我国公众法治意识的进步与有关部门法治素养的提升。

但他也提醒，此类“反转剧”不时出现，有关各方应共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尝到炒作的甜头后，不法分子可能变本加厉，严重损害网络空间治理。”中国传媒大学网络法与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王四

新建议，网信部门要善于区分具体传播行为的动机，依法惩治混淆视听者。

近期，全国“扫黄打非”办将针对自媒体从事虚假新闻等不法活动开展集中整治。

另外，广东省网信办相关工作负责人表示，应严格执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压实内容平台的主体责任，遏制“博眼球”“流量至上”等不良导向，清朗网络空间。

陈一建议，网警、网信、宣传、司法等部

门应形成联动机制，对于热点问题及时发声，强化信息发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缩小不实信息的传播时间和空间。

“舆论反转事件频频发生，除了反映出媒体须加强业务能力，也暴露出社会层面存在的媒介素养与法治意识不足问题。”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明说，“在当今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只有在提升公民媒介素养的同时提升法治意识，才能真正缩短自己与真相之间的距离。”（据新华社）

“填表村医”：填表竟然比看病多？

基层村医曾因“一手拿锄头，一手听诊器”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赤脚医生”。如今，这一备受尊敬的群体却自嘲成了“光剩一支笔”的“填表医生”。“赤脚医生”变“填表村医”，折射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几多尴尬。

填表百余种，手指磨出茧

见到中部某省村医卢先胜（化名）时，他正在村卫生室埋头填表，面前放着厚厚一摞表册。放下手中的笔，卢先胜向半月谈记者展示他右手中指内侧因为长期握笔书写磨出的一层硬茧。

“要填的表实在是太多了。”卢先胜所在的村有1600多人，只有他一名村医，填表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每户都有健康档案，一式三份，还要入户签名，光这就要干1个月；老年人有体检表、随访表、中医体质辨识表、中医反馈表等四五套表；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也是好几套，随访表每季度一次，如果血压或血糖不稳定还要增加；还有儿童、孕产妇的健康管理……”

卢先胜说，由于各类表格名目繁多，他没详细统计过，但听说有老村医给年轻村医移交工作时交代了100多种表格，他觉得“一点不夸张”。除了有村民来看病，卢先胜每天大半时间都在填表，赶上要检查的时候，还得加班到深夜，“最晚的时候写到凌晨2点”。

近年来，随着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覆盖人群和服务范围不断扩大，基层公共卫生工作不断规范，处于最末梢的村医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最令他们头疼的是填写数量繁多的表格、手册。

南方某省村医李家明（化名）告诉半月谈记者，他负责村里近2000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一些表格不仅要填写电子版，还要填写纸质版。

为了填表，一年用个五六盒笔芯不在话下。“比当学生时还辛苦。”有村医说，白天没时间，只能晚上填表，写到半夜12点是家常便饭。

村医不像医生，倒像检查工作的干部

不少村医向半月谈记者吐槽，现在村医主

业是填表，看病反倒成了副业：“十分精力，三分给村民看病，六七分用来填表格。”

究其原因，如一位村医所说，上级管理单位并不在意村医看病看得怎么样，而在乎有明确指标的公共卫生服务数据是否完整。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国家规定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共14大类，每一类都有具体项目和操作规范，国家向村医购买公共服务，村医需按照要求提供相应档案，如档案不符合规定就要扣公共卫生经费补助，而公共卫生经费补助往往是一名村医的主要收入来源。

“对公共卫生的考核就是看你的档案、看你的表格，所以大家只能拼了命地做表格。”中部某省的村医郝变兰（化名）说。

受访村医表示，大量时间用于填表，使看病的时间大打折扣。郝变兰的父亲曾是位“赤脚医生”，一直在村里很受尊敬。“过去的大夫，一个药箱一辆自行车，东边跑完西边跑，一年不到车就骑坏了，大夫和村民接触多，村民也信任医生。”郝变兰说，“现在填表占了大部分精力，看病时间少了，跟老百姓打交道也少了。”

南方某省一位村医告诉半月谈记者，因为整天走访填表，有村民说：“这村医不像医生，倒像个检查工作的干部。”

每天跟表格打交道，也让村医们无暇提升医疗技术。一位年轻村医说，她本想考个执业药师，参考书都买回来了，却因为没时间，一本都没看完。“其实各种培训也很多，但村医去培训时都背着包、带着材料。台上课讲，台下填表。没办法，做不完。”

除了检查无人问，健康档案成“死档”

在南方某省一所村卫生室里，半月谈记者见到4个近2米高的大铁皮柜，里面装满了表格档案。村卫生室负责人徐力（化名）介绍，目前共有3900多人的档案在村卫生室，4个大铁皮柜都快装不下了，卫生室的桌子上是表格，抽屉里也是表格。

“弄材料主要是为了应付检查。”徐力说，今年受疫情影响，实地检查相对少一点，去年市、区、镇三级的检查几乎每个月都有，光复印表格材料就用了十几捆A4纸。

一位镇卫生院副院长告诉半月谈记者，镇

上1年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有700多万元，而花在表格档案材料方面的超过200万元。由于整理档案表格材料工作量大，卫生院还外聘员工专门负责这一工作。

然而，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搞出来的健康档案，却被一些村医称为“死档”。“辛辛苦苦做了这些表，就是为了检查时给上面的人看，等检查完，这些东西就堆在柜子里，基本没啥人看了。”村医李婧（化名）说。

一些村医表示，为村民建立健康档案本身是好事，但目前居民的各类健康档案大多数时候都躺在档案柜里，成了无人翻阅的“死档”。

“公共卫生服务做表格有其积极作用，但现在的问题是，不少时候感觉是为了应付检查而做，对老百姓起不到实际作用。”李婧说。

为村医减负赋能势在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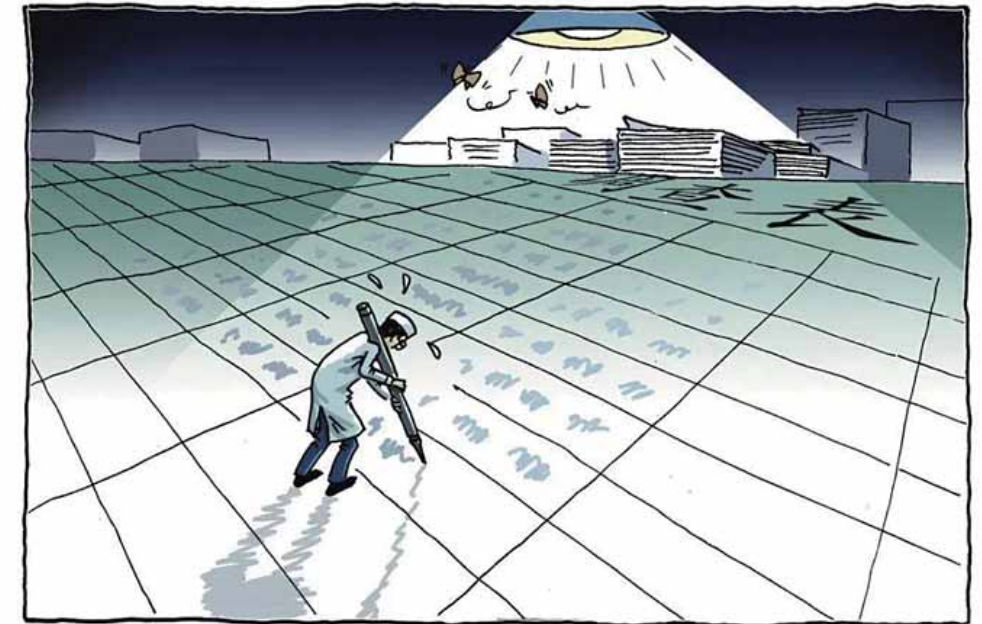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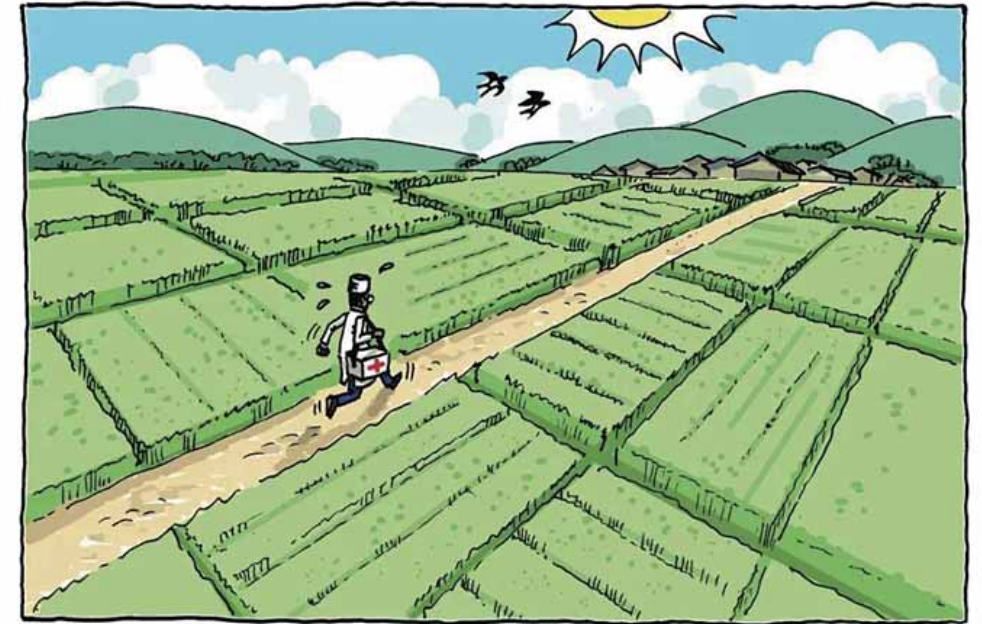
要想让村医当好村民健康的“守护人”，还需为村医减负赋能，把他们从大量不必要的填表工作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群众健康守护者。

一些村医提到，目前部分表格设置还不太合理，一些信息需要在不同的表上反复填写，甚至不同部门要求的两份材料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建议，评估、整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内容，减少不必要的数据收集，简化各类报表，减少重复信息填写。

加快信息化建设，是基层的又一期盼。“我们的工作是为了村民的身体健康，该做的要做，但不能把精力浪费在低效的事情上。”李家明说，期盼以后能普及手机App随访登记，并且在录入电子信息时，减少非必要的纸质表格填写。

“减轻基层医务人员的负担、提高服务效率，推行基层医卫信息化建设很有必要。”一位乡镇卫生院院长说，可以在信息化系统中增加信息筛查比对功能，在信息采集过程中多一些选择项，少一些填空项。另外，对于不同重点人群，可以建立有针对性的健康档案。

有村医建议，把基层群众健康档案与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相连，群众去医疗机构就医可以直接联网调出健康档案，相关就医记录也



可以直接进入健康档案，真正让居民健康档案成为一份“活档案”。

改进公共卫生考核评价方式势在必行。不少村医认为，目前考核方式过于僵化，只注重纸面上的材料，不注重村医实际的服务质量；

考核形式过于严格和繁琐，造成人、财、物资源浪费。他们建议优化现有考核评价体系，在关注量的同时也关注质，关注服务对象受益程度及满意度，不以量化指标为考核唯一标准。

（据新华社）